

中朝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上世纪五十年代两国高端接触的目的和影响

徐行^{**}

<目 录>

- 一、五十年代初两国高端接触的核心议题
- 二、五十年代中期两国高端接触的主要议题
- 三、五十年代后期两国高端接触的重点议题
- 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高端接触的实际作用与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当前朝鲜问题是东北亚乃至世界最敏感的问题。随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进行了调整，而朝鲜坚持保守的内外政策，中朝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年来朝鲜坚持研制和实验核武器，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局势的紧张，也使中朝关系陷入了低谷，欲探讨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和未来中国对朝政策走向，需对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两国通过高端接触建立起的特殊关系进行历史考察。

中朝两国于1949年10月6日正式建交，朝鲜成为与新中国最早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¹⁾ 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两国高端接触不断，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最高领导人曾多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也先后访问过朝鲜。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朝两国为捍卫独立和主权，为共同应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打压，为恢复和重建经济，两国高级领导人频频会面，双方就共

^{*} 本项目的研究得到了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的赞助，谨此致谢。

^{**} 中国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e_mail:ctnqx2013@163.com

1) 1950年1月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到任，同年8月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到任。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同关心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他们的会面对两国关系和东北亚局势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中朝高端接触的主要目的、结果和影响的视角，²⁾ 探讨两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关系，并对当今中朝关系的变化进行历史反思。

一、五十年代初两国高端接触的核心议题 ——主要围绕朝鲜战争的开战与停战谈判问题

据现有的公开的资料，笔者初步考证，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秘密访华和公开正式访华至少有7次之多，中国国家副主席朱德、总理周恩来也先后访问朝鲜。从这一时期中朝高端接触的主要目的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五十年代初（1950—1953年）为第一阶段，双方主要就朝鲜战争的开战、停战、指挥权等相关问题进行磋商；五十年代中期（1954—1957年）为第二阶段，双方主要就战后朝鲜的经济恢复和中国援建问题展开谈判；五十年代后期（1958—1959年）为第三阶段，双方主要就中国从朝鲜撤军和继续援建问题进行交涉；其中尤以五十年代初金日成访华和五十年代末周恩来访朝对两国关系及东北亚局势影响最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日成以朝鲜人民的革命领袖身份第一次访问北京是在1950年5月13日。这次金日成是秘密访华的，没有做公开报道。金日成来华前先去了莫斯科，他向斯大林表示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决心和计划，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斯大林建议他应与中国领导人谈谈。金日成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向中国“通报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³⁾

2) 本文所谈的高端接触，专指两国总理和国家副主席以上级别领导人的会面。由于资料和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每次会谈都做详细叙述（有些秘密访问资料尚未公布），现只能就收集到的资料，对五十年代两国高端接触的情况试加分析。

3) 曹中屏、张琏瑰等著《当代韩国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据中国冷战史研究专家沈志华教授分析，金日成这次秘密访问北京时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5月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5月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为表示中国的支持，毛泽东还征询金日成意见，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⁴⁾

金日成第二次访华是在1950年12月，这次仍是秘密访问，同上次一样没有对外界公开报道。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半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随着战事发展，中朝两国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成为战争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中国军队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军作战受阻，甚至还发生了北朝鲜军队误击中国军队的事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就谁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不得不请示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斯大林赞同由中国来统一指挥前线军队的明确表态，金日成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面商。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朝鲜战争中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和后勤供给问题。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国家副主席刘少奇、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与金日成进行了会谈。

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指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并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⁵⁾中朝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会谈后商定：成立不对外公布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统一指挥两国军队作战和前线一切活

4) 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见“中国冷战网”2005-06-28。

5)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动，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朝方的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联合国司令部下属两个机构，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参谋部，联合一处办公。次日，周恩来将会谈详情电告彭德怀。⁶⁾

12月8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已经回国的金日成，征求他的意见。周恩来提出：“如得其同意或作若干修改，电告我们同意后，即可作为定案，付诸实施。”⁷⁾

金日成返回朝鲜后，同彭德怀再次磋商了两国军队联合指挥问题的具体事宜。据沈志华教授考证，其“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⁸⁾从此，中朝两国军队开始在彭德怀统一指挥下并肩作战。

金日成的第三次访华是在1951年6月3日，这次仍是从朝鲜前线秘密地专程来到北京。金日成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磋商和协调将可能出现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问题。当时中国方面已经确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金日成到来的当日就与毛泽东进行了秘密会谈。在中国战俘问题没解决和美国飞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同意立即与美国签订停战协议，而金日成希望尽快签订停战协议，他认为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恢复建设，巩固政权。中朝双方在何时停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只得再次征求苏联方面的意见。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中朝双方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并提出“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⁹⁾

6月10日 金日成和当时中国国家副主席高岗¹⁰⁾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7) 《中央欢愉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草案》共六条，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11页。

8) 沈志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的矛盾、分歧及其解决》，见“中国冷战网”2005-06-28。

9)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 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10) 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中国设有六位国家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和高岗均为副主席之一。

科。斯大林在听取了双方所谈的情况后，从冷战背景下保持两大阵营的力量均势和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利益角度考虑，在停战谈判问题上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由于苏联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金日成也被迫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停战谈判原则和指导意见。

由此看来，五十年代初金日成的几次访华，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没有进行公开报道，但其目的性很明确，都是围绕着朝鲜战争的开战、作战指挥权和停战等问题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磋商的。由于各自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每次会谈之初，双方意见总有分歧，但最后在苏联的协调下，基本上都达成了一致。这一时期的两国高端接触直接影响着朝鲜的战局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定。

二、五十年代中期两国高端接触的主要议题 ——朝鲜的战后恢复重建和中国援建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中朝两国高端接触，主要是围绕着战后朝鲜重建和中国援建问题展开的。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后，朝鲜开始了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国政府和驻扎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的经济重建给予了大力支援。在这种背景下，朝鲜领导人在战后初期多次访华，意在尽力争取扩大中国对朝鲜战后恢复和经济建设的支援力度。虽然此时中国对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内清洗不同派别有不同看法，但仍派出了国家副主席朱德进行回访，意在巩固中朝关系。

1953年11月12日至27日，金日成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是金日成的第四次访华，也是第一次公开的正式访问。金日成这次访华的

（另三位副主席是非共产党的宋庆龄、张澜、李济深）。1954年全国人大成立后，刘少奇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成为中央政府唯一副主席。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后，朱德任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此前一直是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

主要目的，表面上宣传是为了感谢中国人民和政府在战争中对朝鲜的巨大支持，实际意图是希望争取到中国对其恢复重建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

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于1953年11月12日下午3点到达北京，周恩来、彭德怀，以及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等中国政府领导人到车站迎接，各界代表和欢迎群众挥舞着鲜花、彩旗，挤满了北京站台，周恩来和金日成在站台上热烈拥抱。金日成在车站发表谈话，阐明了他此番北京之行的目的在于：“这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北京，是为了向在战争中曾给朝鲜人民以无私援助的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感谢；并为了在恢复和建设被战争所破坏的我国人民经济中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朝中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互助。”¹¹⁾

金日成到北京的第二天，毛泽东就接见了朝鲜政府代表团，中国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陪同接见。当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专门设宴招待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他在欢迎词中表明：中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向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现在，中朝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新的形势下，中国人民将“尽力支持和援助渴望恢复国家统一、渴望和平和进步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经济恢复，并严防侵略战争的再起”。¹²⁾

这次中朝高层会谈的主题是战后朝鲜重建和中国经济援助问题，具体协商谈判在周恩来和金日成之间进行。中朝两国代表团的谈判从11月14日到22日举行，对于朝鲜方面提出的数额巨大的财力、物力和技术方面的援助要求，双方进行了多次商谈。虽然中国经济实力也很差，刚结束了多年战争，第一个五年计划才刚起步，但鉴于朝鲜重大的战争创伤和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政府仍决定给予其大量援助。

11月16日，周恩来在同朝鲜政府代表团会谈时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决定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至1953年12月31日

11) 《金日成元帅发表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3日第一版。

12)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欢迎词》，见《人民日报》1953年11月14日第一版。

止，这一时期援助朝鲜的一切物资和费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第二，决定在今后4年内再无偿地赠送朝鲜政府8万亿人民币¹³⁾。并说明：根据中国的经验，在经济恢复时期，对工业企业的布局，要适应国内原料条件，保证国内供应平衡，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这样才能发展生产，积累资金。不然，投了资会冻结资金和积压物资。经济恢复时期，要搞工业，但如将恢复重点放在农业和副业上，会有利些，容易些，并且见效快些，同时也有利于工农联盟。金日成表示赞成周恩来的上述意见。¹⁴⁾通过多次会谈，周恩来与金日成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会谈后期周恩来着手组织人员起草《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技术合作协定》、《中朝贸易议定书》等7个文件。

11月18日晚9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与金日成进行了长达6个小时的会谈。

11月23日，周恩来再次与金日成会谈，就中国方面提出的《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7个文件作口头说明：中国在过去三年半对朝鲜的援助金额为7万2950多亿人民币，在新的8万亿人民币的援助费用中，明年将支付3万亿人民币，并就此征求朝方的意见。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中国方面所提出的7个文件。¹⁵⁾同日，周恩来和金日成出席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他们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周恩来发表讲话说：“我们的协定是根据国际主义精神和平等互惠原则而签订的。它把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战斗的友谊和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是完全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¹⁶⁾金日成在签字仪式上也发表讲话说：“今天我们所签订有关朝中两国经济及文化合作的协定，将更加巩固和发展朝中两国人民传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团结，扩大和加强两国间经济及文化方面的长期合作关系，保障两国人民生活上的切身利益，同时在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¹⁷⁾

13) 这是当时的旧币计算，新旧人民币的比值是一比一万，当时的8万亿既新人民币8亿元。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

16) 《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在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12号，第4—5页。

17) 《金日成首相在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字仪式上的讲话》，见《新华月报》1953年第12

金日成的这次访华，可谓收获巨大。通过高端接触，他从中国获得了8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与中国签订了7个合作协定，完全达到了他出访中国的目的，对于朝鲜经济的恢复和金日成政权的稳固起了重要作用。

距第四次访华的11个月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前夕，金日成率团再次访华，这是其第五次访华，这次也是公开正式访问。这次金日成访华的目的比较单一，他是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应邀来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5周年国庆典礼的，通过庆典外交以巩固两国关系。

1954年9月28日下午两点，毛泽东会见了金日成、崔庸健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彭真等陪同会见。10月1日朝鲜首相金日成应邀登上天安门，与中国党政军领导和其他外国政要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国庆典礼和阅兵式。金日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称赞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仅在国内生活方面，并且在维护世界和远东的和平事业方面也作了巨大贡献；在争取朝鲜停战的胜利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事业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一起，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¹⁸⁾

在朝鲜最高领导人多次访华后，为了巩固中朝关系，中国也派出高级领导人访问朝鲜。1955年8月13日，中国国家副主席朱德率领中国代表团应邀赴朝鲜访问，朱德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参加朝鲜解放10周年庆典活动，进一步增强中朝友谊。当中国代表团专列进入朝鲜境内新义州市时，朝鲜副首相崔庸健次帅专程前来迎接，并陪同中国代表团同车到达平壤。

朱德等人到达平壤时，金日成率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往车站热烈欢迎。8月15日平壤各界举行庆祝朝鲜解放10周年的盛大集会，金日成和朱德都在会上发表了讲话。朱德在讲话中指出：“在朝鲜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三年正义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¹⁹⁾8月25日，朱德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结束了访朝活动返回北京，圆满达到了这次出访的

期，第5页。

18)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金日成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54年10月1日第二版。

19)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1页。

预定目标。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邀请了苏联、朝鲜等46个国家的共产党、劳动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朝鲜第二号领导人崔庸健率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中共八大。9月1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设酒会欢迎46个国家的政党代表，毛泽东在会后专门接见了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据沈志华教授考证，当年8月金日成在朝鲜劳动党清洗延安派的举动，导致中朝上层关系紧张，所以金日成没有去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在会见崔庸健时，指责了朝鲜的一些做法，随后还派彭德怀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此后一段时期中国对朝鲜提供的援助减少了。²⁰⁾

笔者认为，虽然由于金日成在国内打击不同派别特别是清洗延安派，引起中国不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中朝关系有点变冷，但总体看来，没有对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造成太大影响。中朝两国通过较频繁的高端接触，互相增进了了解，对于朝鲜不断提出的大量援建要求，中国根据自身外交战略和维护亚洲和平的需要，给与了尽可能多的援助，这对朝鲜战后的经济恢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五十年代后期两国高端接触的重点议题 ——中国从朝鲜撤军与继续援建问题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议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第六次最高级别会谈。这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从朝鲜军的问题。毛泽东当面答应了金日成的撤军要求。金日成回国后致函周恩来总理，邀请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访问朝鲜，具体商

20) 沈志华、董洁《朝鲜战后重建与中国的经济援助》，《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3期。

讨中国撤军等问题。金日成还在12月16日和25日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中国撤军方案。

12月11日，周恩来复信金日成表示接受邀请。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致信金日成表示：“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²¹⁾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还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张闻天、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和中国驻朝大使乔晓光等）离开北京，前往朝鲜访问。这次中朝高端会晤的主题是中国从朝鲜撤军问题。

到达平壤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受到金日成和平壤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金日成和周恩来都在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最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统一朝鲜的各项建议。这些建议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开辟了现实途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这些适时的、重要的建议，并且准备为实现这些建议作出积极的努力。”²²⁾

当日下午，周恩来拜会了朝鲜党政领导人。当晚，平壤市各界代表在国立艺术剧场集会，热烈欢迎周恩来和他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金日成和周恩来在集会上发表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中国政府一向认为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是朝鲜人民通过协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关键。因此，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同时，我们坚决要求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有关国家，同时向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把自己的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远东局势的缓和创造有利条件。”²³⁾

21) 毛泽东致金日成信，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9页。

22) 《周恩来总理的讲话》，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第3页。

23) 《周恩来总理在平壤市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第7页。

2月15日下午，中朝两国领导人继续就中国撤军、扩大和发展两国合作等问题举行会谈。他们还就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形势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中超啊高端接触的一个最重要成果是双方商定了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军队的时间表。周恩来表示：“中国准备分三批撤军，在1958年内撤完。”“朝鲜的问题，应由内部对等谈判解决，别的国家不能干涉。”²⁴⁾

当晚，金日成举行国宴款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17日，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在纷飞的大雪中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

周恩来访朝期间，还在金日成陪同下，先后参观了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和平壤纺织厂，访问了咸兴、元山，参观了兴南化学肥料厂和人民军阵地，还访问了平安南道顺安郡的上阳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了黄海南道的黄海制铁所。周恩来在参观时同朝鲜工人和农业社社员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表示要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和坚强不屈的奋斗精神。在参观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馆时，周恩来还题词：“为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朝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存。”²⁵⁾

2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年底分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指出：“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朝中方面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联合声明强调：“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²⁶⁾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表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也于2月20日发表了关于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声明。

2月2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结束了在朝鲜的访问，离开平壤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25) 乔晓光、曹克强、程文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访问朝鲜》，见《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326页。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见《新华半月刊》1958年第6期，第2页。

回国。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到车站送行。当周恩来在车站广场上向群众告别时，人群一齐摇动着花束和彩旗，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朝这次高端接触，成功地解决了中国从朝鲜撤军问题，对缓和朝鲜紧张局势，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友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撤军问题圆满解决后，中朝高端接触的焦点又转移到援助朝鲜经济建设和加强团结、共同维护东北亚及世界和平问题上。1958年11月底至12月初，金日成应邀率领朝鲜政府代表团再次访华。他这次访华主要目的是参观中国工农业建设情况，与中国领导人商谈继续加大对朝经济援助问题。

1958年11月22日上午，周恩来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金日成一行。下午，周恩来总理和中国国家副主席朱德同金日成进行了正式会谈，当晚，周恩来举行了盛大宴会欢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次日，周恩来与陈毅副总理陪同金日成和朝鲜代表团参观清华大学，并和金日成一起出席了朝鲜驻华大使李永镐为庆祝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举行的宴会，并观看了朝鲜艺术家的演出。²⁷⁾

11月25日上午，周恩来与贺龙副总理又陪同金日成赴湖北会见毛泽东，并参观武汉、广东工厂农村建设情况。²⁸⁾毛泽东在武汉设宴招待金日成一行，并与之进行了正式会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陪同会谈。在此前后，周恩来陪同金日成参观了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应城县红旗人民公社、广东的上游钢铁厂、黄埔人民公社和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11月28日，周恩来在广州机场欢送金日成率团赴越南访问。²⁹⁾

12月6日 周恩来和陈云副总理再次在武汉机场迎来了金日成一行，当晚，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会谈并共进晚餐。7日中午，周恩来陪同金日成乘专机由武汉飞回北京。8日下午6点，周恩来与金日成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朝两国联合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声明上签字。9日上午，周恩来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金日成一行回国。³⁰⁾

这次金日成访问中国，停留的时间较长，参观了中国一些企业，除了周恩来全程陪同外，他还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陈毅、贺龙、彭真等中国党政军领导，争取到了中国的继续援助，巩固了中朝友好关系，达到了其访问中国的初衷。

1959年1月24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往莫斯科，应邀出席苏共21次代表大会。1月25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与同在莫斯科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举行会谈，双方就苏联拟改变“为首”提法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一致认为现在不应当取消原来的提法。这次在莫斯科中朝两国高端接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巩固中朝关系，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产生了一定影响。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大庆，9月27日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他五十年代最后一次访华，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参加中国庆典活动。9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一起会见了金日成。9月30日晚，金日成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80多个国家贵宾的盛大宴会。10月1日，金日成受邀登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庆祝大典。当晚，周恩来与贺龙副总理专门拜访了金日成。翌日下午，周恩来前往火车站欢送金日成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回国。

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高端接触的主要情况，请看如下简表：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朝两国高端接触情况简表

会面时间	会谈地点和主要人员	高端接触的主要目的
1950年5月13日	金日成秘密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双方就金日成武力统一的意图表达各自意见。
1950年12月3日	金日成秘密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谈。	协商解决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的指挥等问题。

3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951年6月3日至10日	金日成秘密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	协调将可能出现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问题。
1953年11月12日至27日	金日成正式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	商讨中国对朝鲜的战后恢复重建和经济援助问题。
1954年9月28日至10月5日	金日成、崔庸健等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会谈。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周年庆祝活动。
1955年8月13日	朱德正式访问朝鲜，在平壤与金日成、崔庸健会谈。	参加朝鲜解放10周年庆典活动。
1956年9月	崔庸健正式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	应邀参加中共八大。
1957年11月	毛泽东与金日成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会面。	商谈了中国从朝鲜撤军问题。
1958年2月14日至21日	周恩来正式访问朝鲜，在平壤与金日成会谈。	讨论决定中国撤军问题。
1958年11月22日至12月9日（期间11月28日后几天金日成赴越南访问）	金日成正式访华，在北京、武汉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会谈。	金日成参观中国工业建设情况，双方商谈中国援助朝鲜经济建设问题。
1959年1月24日	周恩来与金日成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会面	双方讨论了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问题。
1959年9月27日至10月2日	金日成正式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会谈。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庆典活动。

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高端接触的实际作用与深远影响

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朝两国频繁的高端接触，对巩固两国政权、维护两国利益关系重大；对战后朝鲜恢复重建、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对两国领导人之间友好关系的建立和两国外交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进一步探究，当年两国高端接触的实际作用和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

第一，中朝两国领导人通过当面协商，确定了在朝鲜战争中两国军队的配合作战、后勤供应、停战谈判、中国军队撤兵等重大问题，保卫了中朝两国的独立和安全，维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

朝鲜战争期间，金日成的几次访华，使中朝两国对如何协同作战，如何开展和结束停战谈判等具体问题及时进行沟通 and 协商，虽然最初意见不一致，但最终都达成了一致意见，对保证中朝两国军队统一指挥，相互配合，共同捍卫国家利益、签订停战协定，皆产生了直接的实际效果。

朝鲜战争停战后，金日成希望在朝鲜半岛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希望在北朝鲜的中国军队尽快撤出。毛泽东1958年1月24日致电金日成表示，对金日成两次来信中所提撤军方案已仔细研究过，并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中国政府决定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从朝鲜撤军。

1958年周恩来的访朝，商定布置的中国撤军的具体时间表，这不但对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非常重要，而且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多次访华，增进了双方对彼此国情的了解和各自的需求，直接成果是促成了中国对朝鲜不断的大量的经济援助，对朝鲜的战后经济复兴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援助是互相的，除了外交上、道义上的相互支持外，在经济援助方面虽然中国对金日成打击整肃延安派的行为不满意，但对中朝关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中国也没有因为撤军问题而停止对朝的援助。这一时期朝鲜也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支持过中国建设。如1955年中国东北地区电力供应发生困难时，金日成指示朝鲜有关部门：暂停国内部分企业供电，节约国内照明用电，抽出两台发电机专门向中国东北地区输电。

残酷的战争破坏了朝鲜几乎所有的生产设施，造成生产力严重下降。战后的朝鲜到处是被炮火烧焦的土地，被炸毁的桥梁、道路。受战争创伤最严重的是朝鲜的工业，8700多个工厂企业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朝鲜农业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农田遭到破坏，耕地面积大大减少。五十年代金日成多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就是

向中国政府提出援助其恢复重建请求，他取得了应该满意的结果。毛泽东、周恩来在会谈中答应给朝鲜大量援助，据中国统计，三年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已经援助朝鲜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60亿元，中国军人死伤数十万。

停战后，在朝鲜的要求下，中国调拨大量资金和物资，尽量援助朝鲜恢复重建。中国帮助朝鲜修复了原有铁路线，包括铁路、桥梁、车站、山洞、通讯、给水等。中国供应了朝鲜煤、焦炭、棉花和棉纱等原料，另外还供应了机器设备、钢材、粮食和各种轻工业品等物资。1954至1957年中国无偿援助朝鲜8亿元人民币。1958年9月，中朝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959~1962年长期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向朝鲜提供两项贷款的协定》。

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援助与合作，中朝两国贸易额逐年增长，1958年中朝贸易额比1957年增加了50%以上，而同1954年相比则增加了10倍。五十年代中后期，通过两国高端接触，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

第三，中朝两国通过五十年代频繁的高端接触，巩固和加深了两国间的合作关系，两国领导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频繁的高端接触，不但加深了两国政府关系，也增进了两国高级领导的个人感情。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崔庸健等中朝第一代领导人虽然为各自国家利益有过矛盾，但也有很深的个人友谊。金日成一生公开或秘密来华几十次。只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朝关系遭遇挫折，这几年两国高级领导人基本没有接触。

1970年4月周恩来访朝后，向金日成解释了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去除了金日成心中的疑虑，两国关系开始转暖。当年10月金日成就来到北京，再次会见毛泽东、周恩来后，中朝两国恢复了传统关系。

1975年4月19日，金日成再次访华时，得知周恩来重病住院，坚持到医院会见了周恩来。当年7月10日，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之时，毛泽东给金日成发去贺电，这是毛泽东有生之年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周恩来逝世后，金日成决定在周恩来访问过的咸兴化肥厂建立铜像，这是朝鲜第一个外国人铜像，1979年金日成邀请邓颖超访问朝鲜参加铜像落成典礼。

在中国的邓小平时代，金日成仍与中国领导人保持着友谊，但由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而朝鲜坚持保守的思想意识，两国的关系比毛泽东时代差了一些。

第四，双方领导人从各自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皆认为自己给对方付出了许多，对方对自己也相当需要。当年形成的冷战外交思维模式，深深影响了半个世纪的中朝关系。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始终认为，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安危与共的密切邻邦。朝鲜战争中，中国做出的巨大牺牲，战后又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援，朝鲜应该感谢中国。但同时，在两大阵营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支持朝鲜，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必要的。

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在公开发表讲话时，强调朝中两国在战斗中形成的友谊，盛赞中国对朝鲜的巨大支援。表面上对中国表示谢意。但同时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一直认为，朝鲜也给与中国政治上的支持和配合。朝鲜是抗击美国的前线，中国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才支援朝鲜的。朝鲜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对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对中国的国内建设也起了保护和支援作用。

双方都认为对方需要自己，都觉得自己给对方很大支持和贡献，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既存在矛盾，互有不满和猜疑，又互相需要（首先是认为对方需要自己），不弃不离，长期依靠（主要是朝鲜在经济上长期依靠中国），各有所需（中国在两大阵营对抗、开展第三世界外交中需要朝鲜的支持。）的冷战思维下的奇特关系。

中朝第一代领导人建立起来的这种特殊的两国关系，一直保持到上世纪末。当年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的内容甚至已经超出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涉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等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特别是中韩两国建交后，中朝关系开始变冷，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的特殊关系并没有打破。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应客观地评价，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领导人在冷战思维下建立的两国特殊关系，在当时确实发挥过应有的作用。但现在已经不适应世界形势和东北亚局势的新变化，特别是朝鲜不听中国劝阻，不顾各国反对，加紧研

制核武器，使两国关系愈加趋冷，也迫使中国重新考虑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在冷战已经结束，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的今天，中朝两国皆应冷静客观地反思历史，面对现实，着眼未来，建立适应世界局势变化的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就提出“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方针，希望继续加强两国、两党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密切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北朝鲜政权现行的政策与中国的希望渐行渐远，中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两国特殊关系和中国对朝鲜一贯支持的政策已无助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正逐渐调整对朝的经济援助和道义支持。今后中国将谋求与包括朝鲜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朝鲜金正恩上台后，中国对其破坏韩半岛和东北亚和平的行为特别是核武器的研制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对其有损中朝关系的言行不再迁就。今年1月6日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后，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我们强烈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³¹⁾中国希望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并将为维护整个东北亚地区和平做不懈的努力。

< 參考文獻 >

《毛泽东年谱》1—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逢先知、金冲及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31) “中国外交部6日就朝鲜进行核试验发表声明”，见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
-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出版。
-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出版。
-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出版。
- 《周恩来传》第1—4卷，金冲及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 《朱德传》，金冲及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
-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 《彭德怀年谱》，王焰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 《金日成同志回忆录：与世界同行》第1—8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8年出版。
- 《朝鲜战争》，韩国国防部战士编撰委员会编，固城等编译，黑龙江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
- 《朝鲜战争》，李奇微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 《艾奇逊回忆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出版。
- 《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出版。
-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洪学智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 《在志愿军总部》，杜平著，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出版。
- 《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52），刘金质，杨淮生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 《抗美援朝战争纪实》，柴成文、赵勇田主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
-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3卷，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沈志华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沈志华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 《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华庆昭编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 《板门店谈判》，柴成文、赵勇田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出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裴坚章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出版。

版。

《折冲与共处——新中国对外关系40年》，谢益显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当代韩国史》，曹中屏、张琏瑰等著，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出版。

《韩国战争和中国》，朴斗福编，首尔：白山书堂，2001年出版。

《朝鲜义勇军密入北朝鲜与六.二五战争》，金重生著，首尔：明知出版社，2000年出版。

《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约.格登著，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出版。

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

< Abstract >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change process of China and North Korea, it can be a new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rpose, the results and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the senior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tact in 1950s. From 1950 to 1959 years, Sino- North Korea high-end contact was divided into early, middle and late thre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core issues. the early 1950s (1950-1953), the senior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focus on the war, the question of military command and the armistice negotiation consultations; in the mid Fifties (1954-1957), the senior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held a series of negotiations on mainly North Korea's economic recovery and aided by China after the Korean War; in the late 1950s (1958-1959), The senior leaders of the two countries to negotiate mainly on the issue of china troops withdrawal from North Korea and China continued to aid North Korea. Since the two sides were considered from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the beginning of each negotiation, there were always differences of opinion, but finally basic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In 1950s, China and North Korea's frequent high-end contact for the consolidation the regime of the two countr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 Korea's post-war; for the maintain peace in

Northeast Asia, for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produced signific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cold war has already ended,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pattern has changed a new era,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have also changed. China began to reconsider the positioning anew of bilateral relations. China firmly that his position: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and will continue to efforts for peac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Key words: China, North Korea,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Mao Zedong, Kim Il-Sung, The purpose of talking, Historical influence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5. 12. 31.	2016. 1. 27.	2016. 2. 2.	2016. 2. 23.	2016. 2. 29.